

旅行与赋形:《生死场》创作、翻译与传播

王启伟,王翔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萧红的《生死场》以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了“北方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并成为1930年代中国抗日文学的扛鼎之作。1970年代末,《生死场》英译本开始在英美国家传播,西方世界将其解读为“生老病死”的人生哲学,是对东北民众生活画面的真实刻画。作品在英美国家的接受形态对世纪之交国内学者关于萧红《生死场》主题阐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当萧红及其作品沉寂了30多年,抗日主题离开了历史的大背景,民族乡土文学叙事的萧红则被人们所忆起。其英文文本旅行到海外,再回流到中国大陆,《生死场》也被赋予了更丰富的主题意蕴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生死场》;创作与翻译;异域形象;主题重构

[基金项目]2018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gxyq2018019);2017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近代皖人翻译传播研究”(SK2017A0342)

[作者简介]王启伟(1981—),男,山东费县人,淮北师范大学翻译文化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译介学研究。

王翔(1983—),女,河南开封人,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0)05-0221-06 [收稿日期]2020-05-16

《生死场》是一部以“九一八事件”前后的东北乡村为背景,描写当地村民生活的小说。萧红用“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1]刻画了东北乡村的农民及其身边的麦场、菜圃、牲口、荒山、坟地……还有他们生、老、病、死循环往复的生命状态。1930年代日本侵占东北的情势,加上鲁迅的“序”和胡风的“读后记”,让《生死场》成为抗日文学的扛鼎之作,家国民族叙事一直是作品的主旋律。1970年代末,《生死场》英译本开始在英美国家传播,并将其解读为“生老病死”的人生哲学,是对东北民众生活画面的真实刻画。作品在英美国家的接受形态对世纪之交国内学者关于萧红《生死场》主题阐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学术界普遍接受“抗日”与“生死哲学”的双重主题。《生死场》从创作到翻译,从国内到国外,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换,作品被赋予了不同的形态,每一种形态的塑造都源于作品对人性和现实的深刻描写。

一、白山黑水下的“生死场”

1930年代,东北涌现了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

宾基等一批作家,他们创作的“东北流亡文学”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沉重的历史感,同时又与“左翼文艺”“抗战文艺”精神息息相通。在这一作家群中,最引人瞩目的要数萧红,尽管其才华被鲁迅等所认可,但在抗战文学失去其魅力之后,萧红的名字一直被历史所淹没。例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便忽略了萧红及其作品,后来他做过一番解释,“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系统地读了萧红的作品,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2] P16}。直至美国首席汉学家葛浩文的博士论文《萧红评传》面世,加之他撰写了大量萧红研究论文,以及译作《生死场》(与杨艾伦合译)和《呼兰河传》的广泛传播,萧红才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跻身中国现代一流作家行列。

小说《生死场》最初是萧红在哈尔滨1934年4月22日至5月5日《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刊发《麦场》、《麦场之二》,即1935年出版的《生死场》前两章《麦场》和《菜圃》。此时,萧红并未做好写作长篇小说的准备。《麦场》只是萧红反映这片土

地上人们生存状态的试笔之作。笔者作如是推断有着四点依据:一是从现实处境来讲,萧红当时的艰难生活使其不具备书写长篇的时间和精力,创作只是为了赚些稿费,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二是萧红在《国际协报》上刊发的文章是以《麦场》为名,而并非后来定稿的《生死场》。三是友人鼓励。萧红由哈尔滨到青岛后,经济生活相对有所好转,精神生活也有了几个月的轻松时刻。当友人张梅林读完萧红与萧军合著的《跋涉》及其他的短篇后,发现萧红是一位情感细腻、很有潜质的作家时,积极鼓励萧红创作,萧红为此大受鼓舞。在青岛的几个月,她构思并完成了始于哈尔滨的第一部小说《生死场》。四是关于小说文本的考察。首先是故事情节,《生死场》的部分情节缺乏完整性,比如在“菜圃”中,说到福发夫妇给金枝和成业提亲说媒,但在以后的章节中福发夫妇却没了下文,显得有头无尾,不够严谨。从《生死场》全书的框架结构看,前2/3的内容写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老病死,表现作者最痛的人生感悟,后1/3的内容则明显地向抗日方向靠拢,使其表现出明显的文本断裂现象。这一点也可以推断,萧红创作《生死场》的过程并非预先规划好了全书的框架结构,而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描绘刻画东北乡村民众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全书并无明显的一条主线,而是一种全景式的铺陈,由此也形成了萧红独具特色的小说创作风格。

二、个体与家国:双重体感下 《生死场》创作完成

德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取代思想主体的认识论至上性,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关键,是我们直觉被设定的关键,也是我们获取经验和意义能力的关键”^{[3] (P171-172)}。如果看萧红的20多年充满痛苦的生活体验,我们便不难理解小说《生死场》处处充满悲剧色彩情节,以及痛彻骨髓的文字描写。

对萧红来说,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幸福、温暖和爱的代名词,童年时期的呼兰河镇、求学时期的哈尔滨,以及当时重重苦难的国家,无论是“小家”还是“大家”,烙在她心头的是无比痛苦的一连串事件。萧红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3岁时弟弟出生后夭亡,6岁时次弟出生,9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弦。“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

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4] (P927)}《生死场》中萧红叙述金枝和她母亲关系时说“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母亲时时刻刻都在残酷地、疯狂地摧残着孩子。父权社会里,子女在出生时就根据性别被宣判了一生的命运,萧红童年时期呼兰河家中爱的缺失,在《生死场》中有着刻骨的描述。随着祖父的离世,“呼兰河的家”对少女时代的萧红来说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她需要面对继母的冷眼和辱骂、父亲的孤立和囚禁、逼婚逃婚,当萧红最终冲破世俗的阻挡,来到哈尔滨的萧红又被汪姓未婚夫欺骗抛弃,身怀六甲,被困于东兴顺旅馆,因600多元的债务险些被旅馆卖掉,继而萧红又经历了女性生产这一刻骨铭心的痛。“只有通过感性肉体的本体论中介,人类的意义以及审美的意义才能得到自我的揭示。”^{[3] (P172)}在《刑法的日子》一节中,萧红用独特的女性视角描述了一个独特的生育世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人在生产的同时,动物也在交配繁衍。“牛或是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的文字一方面透着对产妇承受肉体痛苦的同情,另外又不无嘲讽自我毁灭式的传宗接代。在女性世界里,身体既是生命意义和审美意义之起点,也是归宿之所在。若没有生命蚀骨的痛楚、刻骨铭心的体验,不会有如此力透纸背的文字。《生死场》中渗透着女性生命体验的文字比比皆是,未婚先孕的金枝、瘫痪在床的月英、被成业摔死的出生不久的小金枝等等。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民意沸腾,全国到处弥漫着抗日气氛。萧红在经历个人生活巨大痛苦的同时,也在经历着国家被外敌入侵的严峻时刻。尽管萧红并未经历过日本人的暴行,抗日活动知晓得也不多,但如果考虑到聚拢在萧红身边的萧军、舒群、金剑啸等作家时,就不难理解《生死场》后1/3篇幅的主题变为抗日。萧红和萧军以难民的身份逃到青岛,回望遭受日军蹂躏的故土和比平时生活更加苦难的东北乡亲,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应该担负起某种与时局有关的责任”^[5]。东北乡村民众的生命过程,除生老病死外又多了一项内容:反抗民族压迫。英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英国面临德国纳粹的进攻,似乎她会理所当然地成为英国民族

主义的捍卫者,但从她1938年发表的《三枚金币》来看,尽管伍尔夫答应捐出金币的请求,但也表达了她对“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时期都把女人视为奴隶、剥夺女人的种种权利的控诉。当父权传统与国家民族主义面临冲突时,萧红和伍尔夫似乎作出了相同的选择。如果说萧红对“小家”刻骨铭心的描写是源于她的个体性生命体验,那么对于《生死场》主题的变换,对“大家”的心理倾斜,则源于其群体性生存体验。从哈尔滨到青岛,萧红虽然逃离了原生家庭,但她却无法逃离风雨飘摇的国家。萧红正是在个体与家国的双重体感之下完成了《生死场》的创作。

三、奴隶的呐喊:生的坚强 死的挣扎

193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不仅拥有众多的书店和出版机构,还享有租界的治外法权,因而成为大批左翼作家的聚集地。时逢萧军供职的《青岛晨报》无力支撑下去,二萧便于1934年11月来到上海。《生死场》的出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在鲁迅的帮助下,文学社愿意出版,但当稿件报送至中央宣传部“文艺审查委员会”时,却由于繁文缛节以及立场不开明等原因,被积压了半年多。多次努力出版未果之后,1935年12月,萧红的《生死场》作为鲁迅创办的奴隶社丛书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由上海荣光出版社出版。鲁迅的“序”和胡风的“读后记”使该书一度畅销。另外,由于国民党对日实行的绥靖政策,书中的抗日描写让《生死场》一出版便被查禁,但现实情况却非常具有戏剧性,国民党政府将其列为禁书,却让人们认为它是即将开始的抗战文学的先导,无形中让它更加畅销,也把20多岁的萧红推向了一生的巅峰,成为世人心目中最有前途的作家。

鲁迅的“序”和胡风的“读后记”对萧红及其小说《生死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然其文学之路又是幸运的。一方面,苦难的时代、苦难的生命体验为萧红创作提供了“苦难题材”;另一方面,萧红有幸获得当时文坛祭酒鲁迅的鼎力帮助。在《生死场》第一版“序”中,鲁迅认为萧红关注的是“北方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1]。胡风在“读后记”中直接把民族家国之类的话语加于作品,“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的站在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蚊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6],称赞

《生死场》中人们爱国意识的觉醒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日精神。受鲁迅、胡风以及时代的影响,用“民族寓言”评价萧红的《生死场》成为那一时期的基调。刘禾曾言,“小说发表后,关于这部作品的解释和评价一直受着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7]。虽然《生死场》仅以30多页的内容描写抗日,而且对日军侵略的事件描绘得也过于牵强,但葛浩文在《萧红传》中把《生死场》列为“30年代抗日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8] P37}。抛开《生死场》的文本不论,在当时的中国,《生死场》的社会价值远远高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

鲁迅、胡风等不会看不到《生死场》对底层人们刻骨铭心的描写,只是在特殊的岁月里,更加放大了书中的抗日描写。萧红无疑是抗日文化阵营的一分子,也有民族主义的使命感,但她并未盲目接受文学创作的流行模式,《生死场》中尚有“抗日文学”的流行元素,萧红后来的小说题材无一例外地是挣扎在底层世界人们的生存状态。但就《生死场》而言,作品“展示给读者的‘战争’并非所谓的理想性、浪漫爱国性的‘战争’,她对战争的刻画多半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的细节着眼。作者并没有从一种广义的历史观点来写战争,而是以一种微妙而尚有力的手法来叙述村民及作者本身所经历而无从理解的种种残忍行为”^{[8] P42}。“苦难”是几千年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苦难”也有几个阶段,最初是为了填饱肚子而苦苦挣扎,当日子无法维持下去,底层民众就会寻找各种活命的道路。比如,为了活着而把女儿送去城里作妓女的王婆,万念俱灰的金枝想到了出家,但是庙庵都空了,她又何去何从呢?底层人们的最后选择是“闹革命”,之所以是“苦难”的最后阶段,因为“闹革命”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不到万不得已穷苦人是不会冒险的。《生死场》中的二里半,老婆和孩子都死了,他把唯一的一只老山羊托付给老赵三后,拖着不健全的腿追随李青山“闹革命”。身为“奴隶”的人们,坚强着“生”,挣扎着“死”,当苦难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时,揭竿而起是“愚人们”的最后选择。

萧红东北人的身份、《生死场》东北乡村的背景、1930年代抗日的情绪氛围、底层人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状态,奴隶丛书的第三部《生死场》注定成为抗日文学作品,“生的坚强 死的挣扎”是奴隶丛书的呐喊,也是苦难时代赋予《生死场》的必然主题。

四、他者的声音：作品翻译及评述

1976年，波士顿的特怀恩出版公司出版葛浩文的博士论文，题为《萧红》。1979年，葛浩文英译萧红《生死场》（与艾伦·杨合译）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序文中，葛浩文提到了翻译《生死场》的困难在于如何再现断章式的节奏、全景式的铺陈和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9]。由此，相关翻译语言、翻译风格等因素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

对《生死场》英文翻译的研究评述大多集中在西方汉学界，受益面也是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高校师生。早在《生死场》英文版出版之前，夏志清在1977年亚洲研究期刊对《萧红评传》出版时所作的书评，对《生死场》作过简要评论，“作为萧红最有力的作品，《生死场》以内隐性的佛教视角描述了令人震惊的乡村世界”^[10]。夏志清将之与西方著名现代派诗人兼文艺评论家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相提并论，认为两部作品中折射的人类历史不过是“出生，纵欲，死亡的过程”。这无疑对即将出版的《生死场》在西方地接受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

乔·黄认为，《生死场》是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而作品松散情节的文体风格则源于中国文学传统，比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柏元的《官场现形记》^[11]。大卫·波拉德在1981年《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通报》中对萧红的《生死场》及其英译本作了进一步论述^[12]。波拉德对萧红所描写事物的驾驭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包括季节、庄家、风俗、各种形态的生命形式等。另外，他还论述了作品中人类与动物毫无差别地生死轮回、让人感到幼稚的小说呈现风格，以及文中差强人意的语法使用。在作品英译方面，大卫·波拉德认为译者对萧红全景式的铺陈风格以及语法使用的混乱作了很好的处理，其翻译效果对于1980年代前每况愈下的中国小说翻译是一次了不起的提升。当然，波拉德也指出了英文翻译中的误译或有待提高的地方，比如“麦场”等词语的误译“四面逃散的鸡群”“麦穗”“盛酱油用的缸”等英译文本中所选用的词汇明显地美化、甚至神圣化了作品中的乡土气息，而没有像萧红一样采用白描式的刻画手法。

此外，西方学术界关注最多的是该作品中的宗教思想。葛浩文在1979年出版的《生死场》英文版序言中写到，“小说大部分内容都带有浓重的佛教色

彩”^[9]。尽管寥寥数语，但仍能看出论者对《生死场》文本中佛教思想的高度认同。此外，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也有论述，“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连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13] [P41]}。这里论者所指的哲学就是佛教中生死轮回。

毕少夫也是较早对萧红《生死场》进行宗教解读的西方学者之一，他于1980年《中国文学》杂志发表《萧红的生死之轮》，论述了萧红《生死场》中的佛教思想。在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推崇西方各种形式的意识流派，而拒绝具有中国传统意义的一切因素，因此萧红《生死场》明显地与潮流相悖的佛教意识非常让西方读者惊讶^[14]。

除受佛教影响之外，毕少夫还认为西方的基督教影响了萧红的创作。因为《生死场》出版时，萧红本人为作品设计了“羊”的扉页。毕少夫认为，从佛教出发，“羊”象征着愚昧无知、忍辱负重、屈服顺从的劳苦大众形象；而从基督教出发，“羊”则可以解释为“上帝的羔羊”^[14]。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萧红的生活轨迹，那么她的创作生涯也的确有基督教的声音。在哈尔滨时，即结识了许多白俄难民；在青岛时，与萧军所住公寓楼上住着天主教修女；而在香港，她病危时住在玛丽医院，“在寂寥中她把一本圣经读完了”^{[15] [P78]}。

东西方学术界对《生死场》解读重心的差异，源于文化思辨模式的不同。英美国家处于一种全民宗教信仰的状态，而现代以来的中国，文人多把宗教看成是精神鸦片。萧红《生死场》中的人物无不经历着苦难、贫困的煎熬、封建的剥削，再加上民族的压迫，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苦大众看不到生的希望。因而要解脱最容易借助的力量便是宗教，希望宗教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安宁，这也不难理解《生死场》中的宗教痕迹。但是，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挽救这片土地上受苦受难的民众呢？只要稍一留意《生死场》的文本，就不难发现萧红给出的答案。在《生死场》第十六章，金枝要做尼姑去，“她想出家，但庙庵早已空了”。通过这一隐喻，萧红用了极少的文字就否定了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意识，宗教不会解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生的希望。在文化思辨模式上，西方学人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宗教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体现在《生死场》阐释话语上，便出现了西方学术界对作品中宗教思

想的认同。

五、旅行与赋形《生死场》 的异域形象和主题重构

随着“抗战文艺”思潮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被贴上抗日文学标签的《生死场》及萧红沉寂了几十年。如果说鲁迅发现了萧红的创作才华,那么葛浩文则让埋在沙粒中的明珠重放光芒。葛浩文对萧红研究始于1970年代初,当时他师从刘无忌在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完成博士论文《萧红文学传记》(又称《萧红传》《萧红评传》)。1976年,《生死场》英文版面世,并在英美国家传播,向世界展现20世纪上半叶东北乡村“给那种种残酷和无知所导致的丑恶所掩盖”的美的地方。

对西方世界部分民众而言,1970年代以前的中国仍是一个披着神秘面纱的东方世界,他们心目中的东方多是来自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的镜像映射,影响甚重的是傅满洲所构筑的普通民众的“东方想象”。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洛莫尔在20世纪创作的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是凶残、阴险、狡诈的“中国恶棍”形象的代表,是“黄祸”的化身。除萧红等当代作家外,赛珍珠对于近代中国在西方普通民众心中形象的改变贡献颇多,她的作品《大地》对中国农民生活作了史诗般的描述。图书馆杂志曾作如下评论,“在赛珍珠之前,大多数西方读者通过廉价小说了解中国,在这些小说中,诸如潜伏在鸦片窟里傅满洲成为中国人的固有刻板印象。赛珍珠把中国人描绘成与贫困作斗争、热爱家庭、有追求更好生活的雄心壮志的人,这让美国人们感到震惊”^[16]。可以说,在1970年代之前,许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源于洛莫尔和赛珍珠作品中人物的“镜像想象”,这种异域形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作品进入西方世界而逐渐改变。图书馆杂志在文学一栏中对葛浩文博士论文《萧红》的出版作了如下介绍:“该著作是研究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一部,东北作家群出现在1930年代的动荡中国,对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本书将加入最近一系列关于中国作家的专著,而这些著作将加深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理解。”^[17]葛浩文对萧红研究及他翻译萧红的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生死场》《呼兰河传》等英译本也成为继鲁迅、巴金等大家之后西方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窗口。多数西方人心中的“东

方镜像”也变得柔和了许多,萧红笔下有血有肉、顽强挣扎的东北乡村民众为这些改变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殖民主义学家萨义德在他的“旅行理论”中提出,由于时空的变化,某种文化理论或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境域中,或者从一种文化向另外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中会产生变异,文化和知识通常又是通过这种流通所滋养”^[18]。萧红的《生死场》创作于1930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氛围,它一出版就注定了与“家国民族”交织的命运。鲁迅的“序”和胡风的“读后记”为《生死场》的主题定下了基调,再加上当时评论界异口同声地称赞《生死场》是抗日文学的奠基之作,以及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激情,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生死场》是抗日文学的扛鼎之作。到了1970年代,葛浩文和艾伦·杨合作完成了《生死场》的英译。葛浩文在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其实,‘抗日’并不是此书的主题,实际上《生死场》是最强有力而且及其忠实地描绘东北人们生活的一幅画”^{[13] [P72]}。英文版序言中如此介绍《生死场》,也为美国读者定下了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主题相悖的基调。《生死场》国外的接受状况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读者和评论界。对其解读也挣脱了“抗日文学”“国防文学”的印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比如说对男权社会的控诉、类似散文的创作风格、女性主义的视角以及鲁迅、丁玲、赛珍珠等作家的比较研究等。受葛浩文等汉学家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再加上时代环境的变迁,《生死场》被重新阐释。其主题也突破了非此即彼的单一型,主题阐释呈现多元化趋势,抗日救亡、民族家国意识仍被学术界接受,但学术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即葛浩文提出的“生死哲学”。

西方学者对作品主题的重构依据的是小说中的文本断裂,前2/3篇幅写生老病死,后1/3写抗日救亡。夏志清在亚洲研究杂志中作过如下论述,“作品后1/3部分的爱国主义描写并不让人信服”^[10]。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语境,重新评估小说的主题,其本身无可厚非,这也是《生死场》的不竭艺术生命力所在。若抛开历史语境来解读小说主题,而且是非此即彼的模式,则过于武断。1930年代的中国东北,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入侵加重了人们的苦难,此一时代背景是不争的事实。文本的断裂从另一个方面说,是左翼作家萧红自觉肩负

起知识分子的责任。由于萧红的坎坷际遇,以及细腻的观察能力,小说对人们生老病死的描写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而“民族苦难”又将东北乡村民众的生命重负推向高潮。抗日救亡、践行知识分子的家国民族使命对于左翼作家来说,则更是理所当然的。文本断裂显示了萧红创作的心路历程,主题的双重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赋予作品的独特内涵。

《生死场》经典的建构路径,需要探讨《生死场》的创作与传播过程,需要梳理作品写作、出版的具体细节,更需要考察萧红在哈尔滨、青岛、上海等地时代氛围。通过作品文本和副文本的分析阐述,我们可以厘清《生死场》的旅行路线图。底层人群的苦难生命状态和萧红的“身体取代思想主体”式生命体验写作方式,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镜像”想象,让西方社会看到了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中国底层民众,而非阴险狡诈的“黄祸”化身。《生死场》一出版便被贴上了“抗日文学”的标签,当萧红及其作品沉寂了30年,抗日主题离开了历史的大背景,民族乡土文学叙事的萧红则被人们所忆起。《生死场》英文文本旅行到海外,再回流到中国大陆——由此也被赋予了更丰富的主题意蕴和文学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鲁迅.生死场·序[M].上海:上海荣光书局,1935.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关键[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4]萧红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5]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J].社会科学论坛,2003(10).
[6]胡风.生死场·读后记[M].上海:上海荣光书局,1935.
[7]刘禾.重返《生死场》[A].章海宁.萧红印象[C].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葛浩文.萧红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9]Howard Goldblatt&Ellen Yeung“Translator’s Preface”,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Bloomington&Lond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79.
[10]C. T. Hsia, Book Review of Hsiao Hung, volume 37, Novemb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1]Joe C. Huang, Book Reviews of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81, March, 1980.
[12]David E Pollard, Reviews of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ume 44, 1981.
[13]葛浩文随笔[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
[14]Friedrich A. Bischoff, Hsiao Hung’s Wheel of Birth and Death,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ume 2, July, 1980.
[15]袁大硕.怀萧红[A].怀念萧红[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6]Nancy Pearl Library Journal February 1 2002.
[17]Warren Collins Library Journal September 15 1976.
[18]王启伟.左翼文学在香港的“文化旅行”[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4).

Travel and Shaping: the Cre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WANG Qi-wei, WANG X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by Xiao Hong, with careful observation and deviant style, shows “the northeast people’s firmness for life and their struggle for death”, which became the masterpiece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the English version began to spread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Western world interprets it as a philosophy of life of “bir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which is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life picture of the northeast people. When Xiao Hong and her works have been silent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 Anti-Japanese theme has lef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narrative of the national local literature has been remembered by people. The English version travels overseas and reflows to China.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is also given rich theme and literary value.

Key Words: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creation and translation; overseas image; theme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王维国、张涛]